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七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四七期 ——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5b）

【回首文革】	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王 辉
【文革一页】	许世友在文革中的恶行	杜钧福
【当事者言】	对新华社实行军管，扭转新华社的混乱局面	李锦华
【文革探索】	文革中毛泽东划了多少“走资派”	佚 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 王 辉 •

◇ 突如其来的绝密会议

1968年2月21日，我上班不久，就听到一个绝密的消息，那就是市革命委员会一大批人，昨天神不知鬼不觉地都去北京参加什么会议了。我那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许多群众代表都去北京开会，我为什么一无所知呢？当时秘书组有两位军队干部，他们也不知道情况。当时市革委会副主任江枫的杨秘书也来秘书组打听此事，秘书组同样告诉他不知道。他发牢骚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呀，通知领导人去开会而不告诉秘书！江枫原来是公安局长，是“革命干部”参加领导班子的代表。这才时过两个多月，人们和杨秘书做梦也不会想到江枫要出事了！

后来得知，这次去北京开会是由支左联络站组织人分头通知的。市革委秘书组管会务的王水田直接到市革委委员家挨户通知，只通知本人21日上午9时到干部俱乐部开会，也不说什么内容，只告知多带点衣服。（王本人也一无所知）听说他们到了俱乐部静静等候，快吃午饭时给每人发一袋面包充饥，下午统一乘解放军的大篷车进京，先去第二炮兵司令部那里住下，

晚上去京西宾馆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革命群众代表以及驻津部队、文艺系统代表约千余人。

人们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群众代表在前一段闹革命时一度成了“主人”，而参加这次活动直到开会前居然一无所知，又成了只会喊口号的工具。

其实，不仅是一般群众代表，就是时任中共天津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解学恭对此会事先也是一无所知。据跟随解学恭的秘书回忆，他随同解赴京开会时，因为当时他的家在北京，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是京西宾馆各个房间的电话一律卡断，服务台的电话又不准使用。解学恭等人先到的京西宾馆，可是人家不让进，还要在外面等候，估计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好电话问题。

这件事为什么搞得如此神秘？原来是后来担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曼恬，给江青写了一封告密信，说天津市出现了“黑会”和“黑戏”。她所说的“黑会”是指1967年全国造反高潮中，各地一些文艺界的造反派联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王曼恬说这个会议是阴谋夺文艺界的权，后面有黑手，就是天津的方纪和孙振。她所说的“黑戏”是指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派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这个戏是以当时闻名全国的“陈里宁事件”编排的。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后来被公安部作为反革命要案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精神病医院治疗。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了解到苏联克格勃对待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很快发现了陈里宁，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1967年初“陈里宁事件”被披露后，全国各地的群众普遍地将“陈里宁事件”诉诸舞台，形成了“文革”中的一次重大的群众性自发文艺运动。其中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是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派排演的六场话剧《新时代的“狂人”》。该版本在六十几天内共演出了47场（包括在北京12场），观众达五万余人。不料，陈里宁又被发现还有攻击毛泽东的言行，很快打成了反革命。

王曼恬是毛泽东表兄王星臣的女儿。她的信触动了江青敏感的神经。“文革”中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她岂能容忍别人染指文艺界，而且还敢妄称夺权。陈伯达出狱后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 中央首长接见

1968年2月21日晚9时至11时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部队负责人接见了天津赴京的代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在会上讲话。

这次会见异乎寻常地由江青主持。江青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二黑”问题。江青一出场就说：“同志们好，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问好！”会上热烈鼓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不绝于耳。江青首先问大家：“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吗？（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做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道理。”其实，在场的有多少人知道这所谓“二黑”？可是群起响应。群众不仅是会喊口号的工

具，而且是盲从的、一呼百诺的、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工具。

陈伯达接着讲话，他浓重的福建口音很难懂，由叶群做翻译。陈伯达首先迎合江青讲了所谓“黑会”、“黑戏”问题。他特别点了一些人的名。他说：“在我们国家内，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相当的一个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杨等等。”陈伯达所说的白桦、李超并不是文艺界的人士。白桦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革”开始就受到揭发批判。李超原为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后任市委政法部副部长，他与文艺界并没有关系。陈伯达在1964年来天津专程去小站地区的西右营看周扬，之后又抓了“小站‘四清’”的典型，与王亢之、方纪、江枫本来都熟识，而且也是了解的。但如今江青抓这些问题，陈伯达见风使舵，极力开脱自己。他说：“我在天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四清’问题的事情，当然在这里就接触到一些人……像方纪之流他们去年不知是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碰见过他们，认识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了话，我那时跟他们说过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呀，不要伸手呀，不要上当呀，你们这些小报里都反映了……但是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呐，还是要登台呀，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又是一回事……”陈伯达进而又说“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

姚文元接着讲话，重点批判了方纪及其作品《来访者》和孙振及其小说《战斗的青春》，并且批判了王昌定《创造需要才能》的文章。

江青接着讲话，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其中有孙振、杨润身、王昌定、袁静、董阳、邵文宝、张贺明、滑富强、王静、李启厚、尹淑坤等。她还点了河北省献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这里又牵连一大批人。因为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在这里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的。江青的讲话，实际上诬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她还说：“由于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建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你们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着重地建议，公检法的问题，应该彻底揭开。”在谈到公检法时，江青还说什么“过去还有一个什么许建国”。许建国是解放天津进城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后任副市长，再后调上海市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后来转入外交部出国任驻外大使。江青接着又颠倒黑白地说：“这个公检法如果不把盖子揭开，害苦了人了，他们不是专了资产阶级政，他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我走到哪儿，他们都盯梢，他们都装窃听器。这允许吗？（众答：不允许。呼口号）要不要打倒他们？（众答：要。呼口号）”据我所知，中央领导人来津都是公安局局长亲自出来负责保卫工作，怎么又成了“盯梢”呢？再有，何时何地何人装过什么窃听器呢？江青还说：“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更是信口雌黄，天津哪里有人整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呢？江青像个疯狂的人，而群众也跟着疯狂地喊口号。

康生接着讲话。他在批判“黑会”“黑戏”中又点了尹淑坤、李启厚的名字，说：“这个剧本的编剧者叫尹淑坤的，有没有在座？（众答：已揪出）（江青：好！）（呼口号）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在不在呀？（众答：没有）也揭出来没有？（众答：没有。有人说：回去就揪。有人说：揪他有阻力。江青插话：不怕阻力！不怕！）……”

最后是周恩来讲。他首先说：“让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问你们好！（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祝同志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他在讲话中除表示完全同意以上讲话批判“黑会”“黑戏”外，还特别表示重视江青的讲话。他说：“去年9月5日江青同志刚讲了三条：我们拥护支持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帅的党

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和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力量革命委员会。讲话之后，就在同一时期，天津有一小撮刘邓陶的死党和陆定一、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尤其是江青同志在11月9日和12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要阶级斗争阵线分明，树立队伍，抓坏人，这样的一个指示以后，天津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搞他的黑会，这不清清楚楚是垂死挣扎吗？”他还说：“刚才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就是要改造公检法……”正是在这次会后，天津立即开展了批判“二黑”（黑会、黑戏）及“一砸”（砸烂公检法）运动。“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

◇ 市革命委员会的改组

这次“二二一”接见之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随即进行了一次改组。当时，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组成人员中，被结合进来的原天津市的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江枫、王亢之、范永中、王占瀛等人。江枫、王亢之、范永中都是在小站地区参加过“四清”的，因为陈伯达当年“红”了，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们参加小站“四清”也成了“光荣经历”，被早早结合进市革命委员会。陈伯达对江枫、王亢之、方纪等人本来是支持的，但是江青态度一变，陈随即迎合，这几个人便成为牺牲品。江枫在散会后立即被隔离审查。王亢之在从北京返回的当天住在招待所中，服安眠药自杀。范永中是原市外贸局局长，革委会成立时担任办事组组长，不久就因所谓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

当时原天津地方干部参加领导核心的就是江枫。江枫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长期从事公安工作，从1960年开始任市公安局局长。天津解放时，江枫属于来自于晋察冀社会部和冀中公安局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主要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市委书记万晓塘带着来自于冀鲁豫公安局的一些人，主要负责经济保卫工作。据说两批来自于不同山头的人马，过去就有矛盾，可是人们都得按组织原则行事，相安无事。“文革”开始后，鼓动人们造反，故矛盾激化了。支持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公安局“造反总部”，反对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政法公社”。前者反市委，后者保市委。万晓塘心脏病猝死后，江枫最早提出怀疑是自杀的。1967年2月14日，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天津警备区接管天津市公安局，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后，即宣布公安局的“天津政法公社”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之后成立“干代会”时，公安“造反总部”又成了“干代会”的主要成员，成为江枫进入市革委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当时江枫参加了市革筹小组。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7年一次接见天津市代表时，周总理曾给江枫写过纸条，要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并在会上表扬过江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京召见过江枫，动员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从江枫在“文革”中的命运就不难看出，当年他是靠中央、中央文革支持起家的，而后又被江青打倒的。江枫是老公安局局长，精通业务，但个性强，对以万晓塘为首的市委有不满情绪，在一定气候下起来造反。记得在“四清”时，赵武成认为公安局右倾，找江枫谈话进行批评，江枫在市委大厅碰见我时，皱着眉头说不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革筹小组又因为个性太强，与驻军负责人发生过顶撞，把他拿下来，正符合驻军的意愿。把他清除掉之后，除了上边还有个解学恭以外，天津市实际上是军人一统天下了。江枫从这次会后一直被“监护”审查，直到1971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1978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对江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陈伯达的迫害予以平反。

当时天津市极少数起来参加造反的领导干部，其后几乎都没有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人们都知道是王曼恬向江青写密信引发了“二二一”事件，但是光凭王曼恬一个人恐怕也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

近年来在关于“文革”的研究中，有人说在“文革”中有两股势力，或者说是两个集团，

一个是江青、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人，其中江、张和王洪文、姚文元关系最密切，后来他们被称为“四人帮”；一个是以林彪为首的少数军队高层。后者与“四人帮”的矛盾不断激化，毛泽东采取措施，林彪出逃丧生，这股力量被粉碎。陈伯达由于向林彪势力靠拢，首先被打倒，“文革”的进程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 王曼恬也没有好结局

王曼恬当时凭借她的特殊关系，向江青写密信告发天津的“二黑”问题，成了“有功之臣”。按照江青的旨意，王曼恬从此上台，担任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立市委后又担任市委书记。

她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又调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来往于津京两地工作。她为什么到中央文化组任职呢？据吴德回忆，当年吴德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把持文化组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吴德工作起来很困难。当时万里给吴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万里说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吴德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在京兼职，工作于京津两地。据吴德回忆，王曼恬在文化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在文化组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于会泳等人接受审查，王曼恬不再赴京工作。在清查工作中，王曼恬的问题成为重点。从1976年12月开始，市委常委开会清理自身的问题，每次都是解学恭先讲，然后王曼恬讲。市委先后召开过六次常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让王曼恬讲清问题，她讲来讲去，一些问题始终也说不清楚。王曼恬对于清查她的问题思想抵触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办公室服安眠药自杀。当年市委书记都在市委大楼小院内办公，每人一间小办公室，一张单人床，中午在办公室休息。那天下午上班多时，警卫人员才发现王的办公室紧闭未开，打开门后发现她昏倒在床上，立即送医院抢救，才没有死成。

为了防止王曼恬再次自杀，市委将王曼恬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她的态度向华国锋、党中央作了报告，并提出对王曼恬实行隔离审查。报告发出后，市委随即指定由市直机关党委和市委警卫处负责人共同组成了20多人的看护小组，对王曼恬采取保护性措施。解学恭对看护小组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一是防止自杀，确保万无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给予适当照顾。

1月10日市委正式成立王曼恬问题调查小组，由我主持的清查办公室负责。1月18日至26日，经市委批准，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天大、南大等五个单位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面对面揭发批判。王曼恬于1月22日给解学恭写信，说批判和报纸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再加上对她实行看护，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月27日晚，王曼恬以和值班人员谈家常、讲故事的办法，麻痹了值班人员。20时她向值班人员要了两片安宁片、一片安眠酮服下，20时15分王熄灯并将门用方凳顶上。值班人员为防止意外，又将凳子搬开，将门半启。20时15分王睡觉不打呼噜引起值班人员怀疑，推门进屋见王没有动静，21时10分又拉亮电灯，见王用被子蒙着头仍无动静。21时40分，值班人员揭开被子见王脸色不好，怀疑其心脏病发作，找来医生检查发现瞳孔放大，呼吸脉搏已经停止，随即采取药物和人工抢救措施，但为时已晚。经医生、法医、现场检验人员确证，王曼恬死亡，是用一条毛巾和床单边缘布条勒在脖子上自缢身死的。

王曼恬自杀的当晚，市委书记王一、赵武成和我都分别赶到现场。王一当晚在家里已经服了安眠药，我们一起听值班人员汇报时，他情不自禁地摆着头。我是第一次看到自缢的，听说“吊死鬼”都吐出舌头，其状甚惨。可王曼恬只是脸色有些青紫，舌尖微向外吐，像因病而死的人一样安详。原来她将毛巾、布条的一头拴在床头栏杆上，一头往脖子上一勒，身子往下一滑就断气了。听说女一中以前有一位女校长，被审查时就是在床上用这种方法自缢的。王曼恬当时曾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看来她是了解这种自杀方法的。无独有偶，时隔14年，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自杀身亡。江青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

王曼恬自杀身亡后，我和市委清查办公室的人员一起到她家清理她的信件等各种资料。令我深有感触的是，我虽然身为办公厅主任，在她生前却从未登过她的家门。她虽然主管文教工作，但是工作上我同她联系也不少，因为她这个人有时管得很宽，什么事情都喜欢过问。例如1975年秋一个周日的早晨，我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王曼恬的电话，说引河桥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业污水排入农田，要我马上去解决一下。我立即找市建委管治理环境污染的人，一起去现场察看解决。那时觉得王曼恬虽然水平不高，但在工作上敬业的，而且敢说话、敢负责。1973年国务院决定将河北省所辖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划归天津市，这对于天津往后的发展非常有利。但在国务院尚未决定之前，这又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王曼恬受解学恭的委托，跑到国务院直接找李先念副总理，再三陈述理由，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文革”初期军队干部一统天下，各级领导核心主要控制在军队干部手中。因为王曼恬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军队干部对她另眼相看，遇事也要让她三分。

当年我们查出，王曼恬自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给江青等人的信件33封、电话记录23份。她的主要问题，就是上述向江青写密信制造了所谓1968年“二二一”事件，后果严重。其次是由于她在中央文化组兼职，经常给天津传些上边的小道消息，特别是1976年她积极鼓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就是她对江青以及中央文革的一切指示积极紧跟。当时市委把王曼恬定为“四人帮”死党，并把王作山、张继尧、陈相文列为王曼恬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现在看来根据都是不足的。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当年几亿人都对毛泽东狂热地崇拜，王曼恬肯定要比别人更多几分愚忠。毛泽东逝世时，我见到她比任何人都要悲痛。说她跟着江青积极参与“评法批儒”，反对周恩来，其实在周逝世的时候，我见到王曼恬也是伤心流泪的。可是在清查中说王曼恬“疯狂地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显然是“欲加之罪”了。

（本文作者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天津市革委会工作，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

□ 《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4期

~~~~~

## 【文革一页】

许世友在文革中的恶行

• 杜钧福 •

一般来说，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里，我也不认为有多少“坏人”作祟，文革也不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史。在当时的环境下，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找出理由。

以叶剑英为例。他从1965年倒罗开始，就是一个造反派。造了罗瑞卿的反以后，又继

续革命，造了彭真的反。特别叫人反感的是，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开文艺晚会。大多数与会干部惴惴然不知所措，叶帅却心情愉快，当场表演了评弹。转过年去，第二次批罗会期间，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又用“将军百战身名裂”一词讽刺之。这些行为看似没有人性，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叶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就会理解他的心情了。

解放初期，叶执掌华南地区大权，强调地区特点，执行后来被批评为“和平土改”的方针，被中央认作右倾、地方主义，冯白驹、方方等大将纷纷落马，叶仅以身免。在罗瑞卿、谭政文（谭力夫之父）等主持下，又罗织了一个“双陈案”，将广东公安厅长陈泊、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坤逮捕，说他们是英国特务。广东省公安厅系统逮捕700多人，广州市公安局逮捕300多人，严刑拷打逼供。后来解到北京审讯时，案犯挤了满满两车厢。此案历时两年才结案，对陈泊，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陈坤因不堪虐待，在1952年10月就已死于狱中，也被判处8年徒刑。陈泊于1961年出狱，旋被投入劳改农场劳动，于1972年病故。文革中，有造反派给他们翻案。但陈泊本人未必知道。他们到死也未看到光明。

所以知道了这些历史典故，我们再看叶剑英在文革中的表现，就可理解了。可以想象他在1965—1966年心情如何舒畅。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

但是，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有两个恶人我永远不能原谅，就是许世友和韦国清。本文只说许世友。

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很早就介入了地区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7月份，他派遣大批军区干部参加驻南京大学的工作队。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还担任了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但是，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他指使梁杜吴三人于11月份反戈一击，揭发了工作队整师生黑材料的内幕。此举后来受到张春桥的表扬。此后，许还多次揭发了江苏省委的“罪行”。1967年“二月逆流”后，谭震林被批判。使其雪上加霜的是在南京军区有人揭发他是“叛徒”，而被打倒。许世友对这一揭发是支持的，因为我在当时的小报上看到，江青有一次说，许世友同志又立了新功，揭发了谭震林的叛徒问题！

江苏一二六夺权，受到以许为首的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当日出动四个连的兵力予以支持。31日造反派召开夺权誓师大会，军区派副司令员饶子健出席并讲话。

夺权之后，军队正式介入文革，许世友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突出，加之以“镇反”等问题，造反派于1967年夏进行“倒许”运动。这些矛盾与冲突很难说谁对谁错，可视为造反派的内战。

现在将上海“一月革命”说成是“反革命夺权”（徐景贤被判刑的主要罪名就是这个）。如果上海夺权是反革命性质的，江苏的夺权也应是反革命性质的，许世友就是反革命后台。当然我不这样看，也不能说是许世友政治投机，他是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许多干部都是这样做的。不能对许的行为予以特别的指责。当然也不能像许多书籍和回忆文章所描绘的，将许说成是反抗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干了别的干部没有干的事。一件是抓五一六分子，另一件事是下放城市居民。由于掌握材料关系，本文主要叙述前一件事。

在江苏，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

‘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官修《南京市志》记载：“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为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83个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运动动员面在百万人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一六分子’。部、办一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列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被关进监狱，5人被‘密封隔离’。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恢复了原貌。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南京市志》）

南京一百万人口，抓了27万。六千职工的扬子江机械制造厂，抓二千。江腾蛟后来也成了五一六分子。（黑雁南：《十年动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中山陵林业学校90%的人都是五一六。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占人数的40%以上。

《近看许世友（1967—1985）》这本书，除了歌颂许世友外，还讥笑那些在被诬为五一六的人，说什么“奇怪奇怪真奇怪，‘五一六’帽子争着戴”。是的，谁愿意戴那顶“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帽子呢？这背后的故事，书中讳莫如深。知情者言：“许多人之所以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大多是逼供信的结果。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杠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招。”在溧水县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27人。（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南京市的重点清查单位是南京大学和734厂。这两个单位由省的“深挖宣传队”接管，他们叫嚣：“要挖地三尺！一个不漏，一网打尽！”734厂打共了一千多名五一六分子。在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杨世杰虽然与所谓“五一六”并无关系，却被“隔离审查”，被打得很利害。他不堪受辱，自杀身亡。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钱新民，被“批判斗争”，被打。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天文系教师朱耀新在溧阳农场劳动期间，被“隔离审查”并遭到毒打。他在夜间试图逃亡，结果不慎跌入水塘死亡。

南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惨遭杀害。

文革初期，李香芝起来造反，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她贴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但未寄出。在1967年夺权后，她所在组织属于好派。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理阶级队伍”。李香芝当时有病，也被揪到牛棚关押，并被批判为“地主分子”、“假党员”、“反党乱军”。直到1970年5月20日才宣布解除隔离，但在审查材料中说她犯有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解除隔离没几个月，从1970年8月份起，她又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遭到残酷迫害，使她精神失常。最后，审查者抓住她说的疯



话上纲，将其判处死刑，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枪决。这一案件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只凭当时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两则文字不通的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8月2日）和“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8月23日）（《南京女演员因写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这里所说的副主任，应指负责清查五一六的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吴大胜。李文卿的书上说他“厚道、正派、做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吴大胜忠于许世友，许世友忠于毛泽东。除去忠于他心目中的皇帝毛泽东以外，许世友很像红色高棉。不但对造反派赶尽杀绝，对和他一样的军队高级干部乘机排除异己。在江苏抓五一六运动中，许世友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身体力行，全力投入。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苏省军区司令赵俊一直在劳改，这次又被打为五一六。许世友亲自审问四次，每次一开头都是破口大骂。审到第四次，赵仍不肯承认是五一六，许世友就喝令他滚回军区，接受批斗。

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也被诬为五一六的黑后台，被投入监狱。

以五一六和其它罪名，江苏省的多数领导干部被长期关押，遭受残酷迫害。省委交通部部长王治平和统战部长高啸平在关押地点被斗死。（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972年许世友派吴大胜送中央政治局中负责清查五一六的纪登奎一包材料，揭发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江苏五一六的总头子，说1967年2月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交给他任务，在江苏发展五一六。还说江苏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是在中南海戚本禹办公室接受任务的。这都是很离谱的材料，因为1967年2月还没有五一六，而戚本禹根本没有办公室。（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当然识字不多的吴大胜未必能认识到其中的矛盾。

杜方平被作为江苏省五一六的重要头目长期关押审查。在监狱中，他受尽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中组部给杜方平摘去了五一六的帽子，落实了政策，送回南京军区安排工作。然而，前往北京迎接杜方平的小车并没有将杜送回南京，而是把他挟持到安徽省的一个县人武部软禁起来。他总共被监禁近10年。（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遭遇的一次浩劫，那么清查五一六就是江苏省在浩劫中的浩劫。许世友的种种恶行，不仅是残害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反党乱军。但令人可悲的是，直到如今，这个作恶多端的人物仍被肆意美化。将种种恶行解释为对毛泽东的忠心和他“疾恶如仇”的性格。

像许世友、韦国清这样的横行不法、反党乱军、草菅人命、作恶多端的地方军阀势力，只能在他们调走或去世后，真相才能澄清。1974年底，许世友调往广州军区，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4年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领导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等人接见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叶剑英、纪登奎等严厉批评了江苏深挖五一六犯的严重错误。叶剑英说南京军区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特别是五一六搞这么多，是同中央对立的。“过去你们南京军区，谁敢讲话，水都泼不进，谁讲一句反话，就打成五一六。”此时许世友已调走，吴大胜等人成了替罪羊，很快一蹶不振。（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中央首长讲话在江苏传达后，江苏各地的支左军代表都撤回了部队。此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苏各地群众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深挖五·一六运动和许世友、吴大胜等人，一时间各

地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举行批判控诉大会，广大群众心中的火山爆发了。南京与各地市县被抓被关的五一六分子大部分相继出狱。

江苏省清查五一六事影响深远。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他还谈到：“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邓小平：《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5年5月29日）

江苏的问题在文革结束前就出现转机，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决策，二是许世友不仅造反派和普通群众中抓五一六，而且迫害了很多干部，包括高层干部。朝中总有人为这些干部说话。如果仅仅是造反派和普通群众受到迫害，其结果要悲惨得多。

许世友在文革里干得第二件坏事是大批下放城市居民。这一点使得他也像红色高棉，或者准确地说他是红色高棉的老祖宗。

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号召学习甘肃会宁经验。当时许多城市组织干部下放农村，但是大部分采取五七干校形式。只有江苏省强迫大批城市居民下放农村。我的一位朋友，父亲是南京市内一位普通理发匠，也被下放。全省涉及人口近三千万。他们在农村没有根基，对农村生活也不习惯，农村也没能力接待如此多的城市居民，所以他们生活都很艰难甚至悲惨。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大批下放居民返回城市，主要是南京，却居无定所，到处搭棚子，靠讨饭为生。直到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居民居住在城墙上挖的洞中，成为南京区别于其它大城市的特殊风景。

不管文革如何定性，许世友和韦国清是永远应被诅咒的两个坏人。韦国清的主要罪行是他命令军队屠杀了将近十万造反派。但我只说许世友不说韦国清是因为至今还有很多人在尽力美化许世友，为其涂脂抹粉，将其说成是反文革的英雄，李文卿的书就是典型。

文革已被彻底否定，反文革成为露脸的事。但是许世友哪一天反文革了？从文革开始那一天，他就派出军区人员参加工作组进驻南京大学。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以后，许世友和造反派暗通款曲，指使梁杜吴临阵倒戈，置江苏省委于难堪地位，后又大力支持江苏省一二六夺权。哪一件事是反文化大革命的？

更重要的是，许世友所办的两件大事：抓五一六和下放居民，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如果是，他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参与者，而且是许多罪行的制造者，而绝对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拿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来说：李文卿的书和其它许多回忆录站在什么立场上肯定许世友？他们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肯定许世友的。许世友无限忠于毛泽东，盲目的忠，愚蠢的忠。我不是毛的粉丝，也不愿完全否定毛，但是，现在已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用是否忠于毛来判断是非了。江苏省千万被诬为“五一六”的群众、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更多的被驱赶的普通城市居民，他们的悲惨经历都放在历史天平上，和“忠于毛”比较，孰轻孰重呢？

你们的良心给狗吃了吗？

□ 选自“杜钧福博客”

~~~~~  
【当事者言】

对新华社实行军管，扭转新华社的混乱局面

• 李锦华 •

◇ 奉党中央之命，进驻新华社

1967年的12月20日，那天晚上，我和来自不同单位的10几名解放军干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40军副政委张纪之同志的带领下，奉命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大家谁也不知道将要受领什么任务，都以急切的心情翘首等待着。深夜1时35分，敬爱的周总理突然来到了我们身边，他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和蔼地询问了每个同志的情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都知道，总理身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与周总理同来的还有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吴法宪等。周总理坐下后，语气非常严肃地对我们做了重要指示。他说：“毛主席昨天还问新华社军管去了没有。新华社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宣传通讯机关，它担负着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进行通讯报道和调查研究工作，担负着国际国内通讯联络工作，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新华社目前两派斗争很激烈，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班子。为了加强对新华社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派你们13位同志组成军管小组，对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总理说：“主席讲，新华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业务一大堆，工作不能一日中断。你们去了要先抓革命，先搞调查。要依靠新华社自身的力量，多进行正面教育，办好学习班，两派一起学习，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尽快实现大联合。”随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党中央385号文件《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并说军管决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有些文字毛主席还亲自作了修改，并要求我们尽快进驻新华社。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军管小组在张纪之同志的率领下，当夜进驻了新华社。第二天下午召开全社大会，宣读了党中央关于对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受到了全社上下一致热烈的欢迎。

军管小组进驻新华社后，第一项工作就是遵照总理指示，先搞调查，摸清新华社的基本情况。先后听取了当时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介绍及要求。找各派头头、靠边站的干部、各方面的代表交心谈话，经过一段紧张繁忙的工作，初步摸清了新华社当时的基本情况。

新华社总社当时共有3000多人，加上国内外分社共5000多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致使新华社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当时的情况是：

一、新华社科以上领导，包括社级领导，全部都被“打倒”了。各级领导都处于瘫痪状态，正如周总理指示中说的，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班子，无法正常工作。

二、派性严重。当时两个主要群众组织，“革联”和“公社”尖锐对立，互不相让，甚至要武斗。我们进驻后的第二天，皇亭子（新华社宿舍）就几乎打起来。我们立即到现场制止了一场武斗。在以后建立班子，配备干部，外派国外分社干部，执行政策等方面，双方都各持己见，甚至严重对立。为了整对方，向江青告黑状，公安机关秘密抓了一些人，造成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这是当时开展各项工作的最大障碍。

三、秩序混乱，不讲政策，随意抓人，批斗人。有些老干部，夜间被抓走批斗，有的老干

部要求把他们送到卫戍区监护起来，怕自己被整死。国际部副主任丁拓就要求把他送到卫戍区。批判干部也不讲文明，实行体罚，不尊重人格。

四、宣传报道业务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新闻不能报道，不敢报道。就拿国际部来说，每天接收大量的外电外讯，但编辑报道的只有几千字，最少时每天只有三四千字。

五、国外分社人员大都撤回国内，对外宣传报道、调查研究处于停顿状态。

六、新华社大门外常有外单位人员静坐，甚至要冲击新华社。为防止不测，军管后，警卫新华社的部队由一个连增至两个连。

总之，新华社当时处于十分混乱和危险的局面。

◇ 促成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

周总理指示，“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尽快实现大联合”，要把极左思潮派性造成的两派群众组织势不两立，思想严重分歧，感情十分恶化的状况，通过一系列的工作，重新将两派群众团结起来，共同为开创和谐的局面而努力。这在当时的确是最迫切、最关键、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任务。我们通过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特别是一次次地找两派的大小头头促膝谈心，向他们反复宣传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宣传顾全大局、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必要性，苦口婆心地进行教育劝导，从根本上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认识和觉悟，为实现大联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坚冰终于被打破了，融解了。1968年的春节，新华社的广大职工是在一派欢声笑语中度过的，两派实现了大联合，大家从内心深处感到满意和高兴。在此后的5年里，干部群众团结一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有问题共同协商解决，整个局势一直都很稳定。

◇ 周总理亲自抓宣传报道

周总理非常重视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宣传报道是新华社的头等大事，毛主席说，一日也不能中断。周总理指示军管小组要依靠新华社总勤务组抓好宣传报道工作。整个5年多的军管期间，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开展的。军管小组认真贯彻了周总理的指示。首先派政治思想好，有一定业务能力的干部，如李荣欣、章同华、王国贤、杨玉亭分管总勤务组，帮助支持他们大胆工作；其次是逐步恢复副社长工作，要他们集中精力抓宣传报道。后期宣传报道工作主要由朱穆之、邓岗、石少华、缪海凌等副社长亲自抓。第三，是及时充实和加强总勤务组的骨干力量，先后将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资深的解力夫、赵棣生、彭迪、丁曼等调入总勤务组；第四，是张纪之集中主要精力抓宣传报道，每天深入总勤务组，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经常接受并贯彻周总理指示。凡重大的国际国内新闻报道都是报总理亲自审批。

◇ 913林彪叛逃事件我们知道的最早

1971年9月13日深夜，周总理就把张纪之同志叫到人民大会堂，告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行在山东烟台乘空军三叉戟飞机向北外逃，要求有关林彪的新闻报道一律扣发，要新华社特别注意苏联和蒙古方向的动向。张纪之回社后，立即召开了军管小组和各有关部处一把手开会，传达了总理指示。这是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谁也想不到，以为听错了，反复又问了几遍，但事件既然已经发生了，谁也改变不了。可以说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是最早知道林

彪叛逃消息的。随后张纪之要求各有关部处一把手立即上岗值班，严格按总理指示执行，扣发所有有关林彪的新闻报道，要求电务处增加接受电台，密切注意苏蒙方向的消息，有情况立即报告，军管小组的同志也都分头参与监督执行。新华社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当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坠毁后，总理又对新华社的新闻报道作了周密细致的布置，内外有别，内紧外松。林彪事件公开前，正值1971年国庆节前夕，林彪是副统帅，又是国防部长，涉及到林彪的新闻特别多，政策性又特别强，报到不报道，用什么标题，放在什么位置等都是总理亲自审定。

周总理也严厉地批评过张纪之，记得有一次张纪之向军管小组传达总理对他的批评，是一件涉外的报道（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外事记者李琴捅的漏子，将不应该报道的事给报道了，但她没有主动向总理说明，总理很生气，严厉地批评了张纪之，张向总理作了自我批评，也在军管小组作了自我批评，没有责怪记者李琴，也没有做任何解释来开脱自己的责任。我的印象是，张纪之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有领导风度，心怀若谷。

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都是在周总理亲自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开展的，重要新闻报道，特别是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新闻报道都要送周总理审批后方能发表。总理太辛苦了，新华社的每日截稿时间多要等到凌晨，收到总理的批示方能下班。

◇ 实现领导班子三结合

周总理指示，实现“三结合”是最大的任务。所谓“三结合”就是把表现好的、有威望的、有能力的干部，加上群众代表和军代表选拔结合起来，组成领导班子。这其中最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就是如何重新启用被“打倒”的和“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新华社当时的干部状况十分严峻，他们有的被党中央点过名，有的正挨批斗受“专政”蹲牛棚，有的背有种种“罪名”……军管小组通过办学习班，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选拔党性强的干部组成专案组，对各级干部进行审查，做出正确的评估并得到群众的认可后，一大批干部重新站出来，担任了不同岗位的领导工作。到1972年9月，原部、处以上的领导干部被“解放”的约占87.9%，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的占84.5%。有一次周总理在天安门上对张纪之说，你们对宣传报道业务不熟，新华社有些副社长如缪海凌、邓岗，让他们出来抓业务。军管小组立即上报，恢复了缪、邓副社长职务。此后新华社的宣传报道业务，主要由他们来抓。再如国际部的谢文清副主任，1968年就被结合到国际部的领导班子，后来又成为一把手。国际部其他领导如彭迪、丁拓、孔迈、陈佩明、王飞、李楠等也都陆续恢复了“官职”。一批年轻干部也被吸纳进了领导班子，如鞠庆东、于恩光、许家砚、聂坤儒、王子英、郭静等。新华社的“三结合”实际上只有两结合，军管小组成员没有参加进去，军代表在新华社各单位主要是支持和帮助工作。

◇ 提出重用朱穆之

朱穆之同志是新华社“文化大革命”前的副社长，军管小组进社前也是“重点批斗和专政对象”，在党中央《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中他被“点了名”。同时被“点名”的还有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和新华社副社长王敏昭。

对朱穆之同志的问题，军管小组进驻后曾组织专案组认真进行了审查，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但因党中央“点了名”，军管小组不敢明确表态，只是一般性地组织群众做了批判。后来对朱穆之解除了“专政”，送他到“五七”干校进行锻炼。当得知毛主席对吴冷西同志有批示，人民日报准备“解放”吴冷西的消息后，军管小组立即对朱穆之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当即给党中央写报告，提议恢复朱穆之同志副社长职务，将朱穆之从“五七”干校调回总社，并安排住在当时新华社最好的住房——专家楼。党中央对我们的提议迅速给予了批复，朱穆之的很

快被恢复了副社长工作，主持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军管结束前，新华社要建立正式的领导班子，中组部提议张纪之同志任党组书记兼社长，张纪之积极建议由朱穆之同志担任社长职务。后来，党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任命朱穆之为新华通讯社社长，张纪之为党组书记。

◇ 建立正式的领导班子

在新华社建立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是周总理最关心的事，军管小组始终都当成头等大事，认真对待。军管后期，为建立正式的各级领导班子，对干部的候选人，慎重细致地考察评估，贯彻了以原来老干部为主，适当吸收优秀年轻干部，兼顾到两派群众组织的思想感情，要有一定数量的女同志参加领导班子等原则。通过座谈讨论，个别谈话，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新华社过去管干部工作的同志意见和建议，如沈定一、徐舟力等，不少人选和方案都是他们提出的。在军管结束前，新华社从社级领导到各部、处的领导班子都建立起来了。就拿社级领导班子来说，原来的副社长邓岗、缪海凌、穆青、石少华等都恢复了职位，朱穆之还提升为社长，年轻干部吸收了两派的头头，郭全有、肖祥树参加了领导小组。这两位同志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在克服派性，促进大联合，巩固新华社的团结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周总理示意领导小组要有女同志参加，经过做工作，李琴也成为领导成员。原部、处级干部中选拔了解力夫为副社长。解力夫同志，1939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做新闻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跟随部队在枪林弹雨中采访报道，做出了贡献。到新华社后，长期在参编部工作，他的文字水平、业务能力都很强，外文也不错。他的政治思想水平，原则性也很好。文化大革命中，他能正确对待两派群众，群众对他反映好，深受群众欢迎。他为人正直，严于律己，谦虚和蔼，善于团结同志。他生活俭朴，公私分明，清正廉洁。他后期调总勤务组，分管国际宣传报道，能正确掌握政策，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他在群众中威信高，他的提升，得到新华社的广大干部和军管小组的热情支持。

在建立领导班子初期，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军管小组张纪之被任命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兼副社长，军管小组副组长张政德被任命为副社长。

◇ 派王殊去西德任首席记者

“文化大革命”初期，新华社驻外记者大都被调回国内参加运动，军管后期形势稳定，各项工作逐步走入正轨，恢复和加强国外分社工作，派出驻外记者也就被列入了议事日程。派谁出去和派往哪个国家，这在当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国际部的于恩光被派往伦敦任首席记者争议就不大，比较顺利。于恩光思想品德好，党性强，能团结人，工作积极踏实，业务能力强，他到英国后工作很出色。

接中央指示，新华社要向西德派驻记者。当时中国和西德还没有建交，去西德的记者担负着重要而艰巨的调研任务。军管小组认真研究后，认为王殊同志能担此重任。但派性和极左思想的影响，不少同志反对派王殊去波恩任首席记者。军管小组在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后，决定派王殊同志去西德。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殊是一位出色的新闻、外交工作者。他在西德工作期间，克服种种困难，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党中央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首肯和重视。毛主席、周总理亲切接见了，谈了两个多小时。毛主席还亲自递烟给他，王殊没舍得吸，想留做纪念，没想到被在场的乔冠华部长给吸掉了。不久，中国和西德正式建交，王殊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王殊成为中国驻西德的大使，以后又任外交部副部长。这是新闻工作者不可多得的荣耀，也是新华社的光荣。

◇ 整顿国内分社

新华社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有分社，遵照周总理办学习班的指示精神，军管小组分期分批将国内各分社的干部调回北京办学习班，提高他们的认识，统一思想，克服派性，正确处理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关系，并调整和加强了分社领导班子，使分社工作走上轨道，保证了宣传报道、调查研究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 周总理关心外事工作

周总理对新华社的外事工作十分关心。“文革”初期，新华社的对外活动几乎中断，军管后期对外活动陆续恢复，先后邀请了不少国外新闻代表团及新闻工作者来华访问。刘福平同志领导外事部全体同志认真执行对外政策及外事纪律，积极负责，勤勤恳恳，热情周到，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接待任务。总理很支持这项工作，被邀请的很多代表团他都亲自接见。我在军管小组中分管外事部的工作，先后参加了周总理接见外宾3次，李先念副总理和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外宾各一次。墨西哥最大的一家报纸《至上报》的社长1972年来华访问时，这位40多岁的社长独自经英国飞中国，一下飞机就要求周总理接见他（原计划没有安排总理接见），下榻北京饭店后，他哪里也不去，非要见周总理，如不安排他见总理他马上就回国。经请示，周总理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位社长得知后非常激动，来时的便装马上换成了整齐漂亮的西装。到了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总理和他合影留念，与他进行了热情交谈，回答了他的很多问题，他非常满意，更加敬佩周总理了。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这条新闻，并发了照片。

总理回答关于智利阿连德当选总统问题时说：“智利有长期的议会道路，所以阿连德的方针是比较独立的，但不是完全独立。之所以最后得了那么多票，是因为反革命的子弹帮了他的忙，这个子弹一打，激怒了智利人民，几乎全投了阿连德的票，开始不是这样的。我还提醒你，如果军队受到外国势力的插手，还有出乱子的可能，即发生政变的可能，我们希望智利官兵都是爱国者，保护国家主权独立。阿连德的政权是民主政权，民主政权没有武力支持是不成的。你们拉美进步政权，被武装力量推翻的，数不胜数，你比我清楚”。

重温历史，周总理的论述不仅非常精辟，而且具有远见卓识。民选的智利总统阿连德不合美国的口味，美国政府就操纵支持智利的独裁军人皮诺切特，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了合法的智利阿连德的政权，实行反革命专政和白色恐怖，杀害了千千万万的智利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智利人民现在仍坚持要审判他，讨还血债。

周总理的接见和谈话在墨西哥《至上报》头版发表后，受到各方关注，影响很大。

为了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1971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巴勒斯坦周的活动，阿拉伯国家来了20多位新闻界朋友，有社长、有总编辑、有记者，他们其中有的很富有，穿戴讲究。有的却很穷，如埃及两位记者，连换洗的衣服都很少。他们到中国后，受到热情地接待，都非常高兴，十分活跃，非常友好。

周总理很重视这批新闻界的朋友，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了他们。当他们来到大会堂时，总理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随后每个人都作了自我介绍（包括国家、姓名、从事的新闻单位等）。总理对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表示支持并欢迎他们来访。当总理表示愿意回答他们提问时，记者们纷纷踊跃地举手提问，总理对他们的提问都一一作了回答。有些记者还想二次提问，总理说你们提的问题全都回答了，你们没有提到的问题也回答了，并将记者的姓名、国籍、新闻单位及提出的问题一一地重复了一遍。总理的记忆简直神了，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最后新闻界的朋友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周总理的敬意和感谢。

以后我又陪同这个新闻代表团在北京参观了燕山石化厂，中阿友谊公社。在天津参观了杨

村解放军军事表演，受到了天津市领导的热情款待。随后又乘飞机到上海进行参观访问，受到上海市领导的热情接待，最后又到南京参观了长江大桥，欣赏了南京军区幼儿园小朋友精彩的艺术表演。

在北京期间，首都新闻界在北京饭店为他们举行了招待宴会。

◇ 参加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尼泊尔贵宾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郭老，郭老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他身体很好，因耳聋带着助听器，慈祥和蔼，待人亲切，平易近人。他认真听取了外交部凌青司长的情况介绍，当客人到来后，他热情地握手迎接。照相后入座，与尼泊尔贵宾进行了诚恳的交谈。他着重宣传了我国的外交政策，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对我国对外政策的五项原则、八项准则记得非常熟，一条不拉，一字不差，不愧为人们常赞誉的文豪、天才。

文革前，北京的高级饭店不多，北京饭店就算是最高级的了，每个标准间，每天10元钱，当时觉得那么贵。新华社的外国客人多住在北京饭店，也有住在新侨饭店和民族饭店的。服务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很好，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大公无私，不贪不占，无私奉献。遇到有送小费的，或恶意试探的，都有礼貌地予以谢绝，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高尚的人格尊严的体现，受到了不少外宾的敬重和赞扬。

当时的宴请标准，中餐每人4.5元人民币，西餐每人5.5元人民币，香烟、酒水除外。四菜一汤，饭菜质量都不错，外宾反映较好。

◇ 军管小组成员的情况

中央决定派以张纪之同志为首的十三位同志组成军管小组，对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

组长张纪之，四十军副政委，副组长张政德，高等军事学院教员，甄文君，政治学院教员。组员：李荣欣，高等军事学院教员，孙浩，政治学院教员，章同华、王志军、郑苏枫，后勤学院教员，赵锋、董楚荣，空军学院教员，李锦华，通信工程指挥部参谋长，刘允中，通信团教导员，王树榕，总参二部外交官。另加张纪之的秘书胡荣华。后来又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和增加了部分同志。他们是：吴萱、王国贤、杨玉亭、俞林森、申云来、张银水、张文盛、范永忠、张成荣、张庆丰、张法杰、王绍云、王槐春、杜秉林，李春祥、王文杰、范振寰、孙志华、席文华、阴超群、杨冠德、刘广仁、刘崇基、李德山。其中张文盛同志春节前去山西永济新华社五七干校慰问干校学员，心脏病发作，经抢救无效，病故于西安。张文盛同志是某师的副政委，工作积极负责，群众关系较好，有威信。他的去世令大家很悲痛。新华社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全社职工都参加了，大家为这位为军管工作献身的好干部送行。

周总理对军管小组非常信任和重视，特别是张纪之同志经常直接从总理那里受领任务，接受指示。当时新闻界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局、外文局、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新影等参与新闻单位的重大活动，都是指定张纪之牵头，新华社主办。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行记者很多，首都新闻界举行宴会招待美国新闻界人士，就是由新华社主办，张纪之牵头。这是一次盛大的中外新闻界人士大聚会，美国新闻界人士近百人，首都各个新闻单位的领导和代表也有100多人。宴会在前门北京烤鸭店举行，张纪之致词欢迎美国新闻界同行。美国记者非常高兴，十分活跃，他们大概也是头一次享受名扬四海的北京烤鸭，当服务员用盘子将冒着热气、油光酥脆、焦黄滚圆的北京烤鸭展现在宴会大厅时，美国

人高兴地叫了起来。不少人拿出相机拍照，有的同服务员合影，有的好奇地询问，气氛非常热烈活跃。宴会后又安排参观了烤炉，介绍烤鸭制作的全过程。美国人非常满意，非常高兴，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友好交流，宴会给他们带来了美好的纪念。

类似的活动，如宴请朝鲜新闻代表团、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罗马尼亚新闻代表团、阿拉伯国家新闻界等都是张纪之牵头出面。

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等重大节日的宣传报道，也多是由张纪之同志牵头，协调准备，组织完成的。筹委会每次都给张纪之发很多请帖，我们军管小组的同志也沾了光。1970年9月30日下午7时，我参加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国庆招待会，能够直接聆听总理国庆讲话，和总理一起参加国宴，心情十分激动，感到非常荣幸。

◇ 张纪之同志是位好干部

张纪之同志是位好领导，好干部，新华社的军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军管小组，特别是张纪之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切实认真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政策，特别是周总理的具体指示，工作上抓住了重点，抓住了关键要害，着重抓了大联合、三结合、解放干部和宣传报道工作。注意掌握政策，对人的问题处理实事求是，特别慎重，保护了大批干部，争取团结大多数，促使新华社形成了团结稳定的大好形势。

他带领军管小组全体同志忘我地工作，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把新华社建设好的艰巨工作中，5年多的时间，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节假日都很少休息，同新华社的广大职工同吃同住同工作，鼓足干劲，克服重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军管人员，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光明磊落，不搞特殊化。军管人员不仅没有违法乱纪行为，而且也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家属子女安排工作，没有占有新华社的住房。军管结束时，除张纪之、张政德根据上级的安排留下工作外，其余军管人员全部撤离新华社，没有占新华社的任何职位，可以说是为党、为国家无私奉献，不求回报。这在当时的北京和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张纪之同志离开新华社后，有人想借机整他，说他反总理，还有人找我调查。我说，张纪之始终都认真地贯彻周总理的指示，新华社的成绩就是贯彻总理指示的见证。

◇ 我受到的教育和感受

认真按总理的指示办事，就会事半功倍，成效显著。这里有个比较，四人帮粉碎后，我参加了中央工作队，解决七机部老大难问题，得知周总理为解决七机部老大难问题，接见七机部有关人员30多次，没有解决问题，总理说自己无能。宋任穷同志说，我们听了很难过，不是总理无能，而是四人帮在破坏。四人帮粉碎5个月后，七机部仍处于瘫痪混乱状态。解决新华社的问题，由于军管小组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新华社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关键所在，就是是不是认真按总理的指示办事。比如总理一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一碗水要端平，办学习班，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大胆使用好干部，业务上要依靠总勤务组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军管小组认真贯彻落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负责新华社国际部，就是按这些指示工作的，首先是对两派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公道正派，通过办学习班，做思想工作，促使双方互相信任，互相尊重，消除隔阂，促成大联合。这样的联合，思想基础牢固，经得起考验，没有反复，大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派性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对人的处理容易发生偏差，所以对人的处理一定要特别慎重，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搞清事实，要严格按政策办事，不能偏听偏信，感情用事，不能急于定案，不能因自己的疏忽伤害干部。这方面我在国际部遇到过不少事例，比如在审查刘宾江同志时，发现他的档案中提高觉悟后，批评自己有过骂毛主席的语言，在派性严重的形势下，假如被断章取义地捅出去，一定会被打成反革命。我要求审查人员一定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再比如谢文清的夫人郭宪球，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因为谢文清派性大，对立面很反感，想借机将郭打成特务。我看了档案，了解到她是在特务机关工作，但并不是特务。经反复做思想工作，总算把这件事平息了下来。又如，国际部年轻的编辑涂欣欣，有人检举她骂林彪像奸臣，经了解，她在她哥哥的单位和一些年轻人闲谈，有人说看林彪的长相像奸臣，她也说了，她哥哥那个单位知道后作了批评教育，没做组织处理。这事被国际部的有些人知道了，因为是对立面，所以非要把她打成诬蔑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我当时认为这件事，她哥哥是主要当事人，他们单位并没有按反革命处理，涂欣欣只是附和参与了，而且有认识有检讨，不应该按反革命处理，但是在一些派性严重的人强烈要求下，军管小组某领导点了头，我当时坚决反对，但无能为力，最后涂欣欣被抓起来了，据说后来精神失常了。对此我非常痛心和内疚，觉得对不起这位年轻人。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新华社群众服务。军管5年多来，我和他们朝夕相处，白天同他们一起参加运动，开会，办学习班，谈心，交流思想，统一认识，审查干部，开批判会。夜间就到各编辑室，看他们编稿、发稿、审稿，体察他们的辛勤劳动，跟他们每个人都接触过，交谈过，对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一定的了解，我们相处的很好，向他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如国际知识、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使得我至今对国际形势仍很关心，也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这和他们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工作中顾全大局，维护党的根本利益，不计前嫌，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支持老干部出来工作的公而忘私的精神，为新华社的团结稳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使我深受教育。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们相处得很好，非常和谐，工作进行得顺利，心情也自然舒畅。

新华社秘书处有一个机要阅览室，这里的机密文件特别多，有外交部、中央调查部、总参二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调研资料及电报，有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些资料主要提供给各部门主要领导参阅的，军管小组的同志也可以阅读，我经常利用晚上去阅读，增长了见识，受益匪浅。像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毛主席同尼克松的谈话，毛主席同田中的谈话，我都看过，很受教育，开阔眼界。比如谈到翻译唐闻生时，由于她出生在美国，外语又很好，而美国总统候选人必须要出生在美国，毛主席就风趣地说她可以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毛主席还要求外交部派一些娃娃到国外去学习外语，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后来新华社派了一些小孩随父母去国外学习外语，有的开始是白天送到外国人家里学习外语，晚上接回家，效果不理想，后来改为全日都在外国人家里学习，节假日接回来，学得很好。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他反对到处为他塑像，说白天晚上刮风下雨都让他在外边站岗。此后在国内把塑像大都处理掉了。

在新华社军管的后两年我分工负责新华社办事组的工作。军管后期建立健全了社级领导班子，在新华社核心领导小组下，设立了总勤务组，管宣传报道；政工组，管政治工作，管干部，管运动；办事组，管电务处（负责接收世界各国通讯社发布的电讯新闻）、行政处（负责吃住行）、外事部（负责接待与新华社有关的外宾）、秘书处（负责中文发稿，机要档案及社领导的有关活动）、印刷厂、图片社（负责洗印新华社各种图片）、战备单位（负责打起仗来新华社的地下坑道建设及机动的战备车队）。

办事组组长李延年、副组长王毅之。这是两位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党性好，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能团结人，我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他们对我也很尊重，协调配合较好，各项工作都

开展得比较顺利。我们在一起相处友好，心情愉快。

周总理对新华社的战备工作很重视，军管小组根据总理指示，对原来的两个战备车队进行了精简整编，编成了一个战备分队，使其更精干，更便于机动，更适应战时需要。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了战备分队和有关部门的编辑记者，结合新华社的情况进行野战拉练。组成了两个野战机动分队，每个分队都能抄收新闻，发新闻稿，编发参考消息，出新闻图片。两个车队都有电台，印刷设备，图片洗印设备，发电设备，两个分队保持经常通信联络，一个分队向易县方向行进，一个分队向北戴河方向进发。沿途还组织了参观学习，如参观了焦庄户地道战设施，还和当地老百姓座谈联欢。为使知识分子得到锻炼，还组织了行军，急行军，通过敌人封锁线，夜间站岗放哨等活动。大家普遍反映较好，不仅得到了锻炼，还受到了教育。

经周总理批准，还将新华社战时的地下工程建设纳入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地下首脑工程系列。组织了专人进行勘察、定点、设计、施工，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工程任务，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建设。此外还新建了印刷厂和图片社，改变了原来陈旧落后的面貌。

□ 原载《难忘岁月——一位通信战士的岁月记忆》

~~~~~

### 【文革探索】

#### 文革中毛泽东划了多少“走资派”

• 佚名 •

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曾经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指南，但是“十六条”并没有定义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提出判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客观标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以后被简称为“走资派”。毛泽东直到去世之前还在谈论“走资派”，说“走资派还在走”。但是，直到去世，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供操作的判别“走资派”的标准。

那么哪些人是“走资派”呢？毛泽东最初的想法是把所有的“当权派”都放到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去“经风雨”，让广大人民群众来鉴别谁是“走资派”。但是，这个方法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指控为“走资派”。这当然不符合毛泽东最初设想的“走资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既然没有判别标准，就只好依赖“列举法”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少奇、邓小平无疑是“走资派”，毛泽东也说过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走资派”。但是，毛泽东不可能列举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的“走资派”，于是中央只好列举出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走资派”，再往下就没有办法了，就由各地各部门革命委员会去决定了。

1967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走资派”。这55名“走资派”的名单和当时的职务见附录一。

其中没有刘少奇和邓小平。从1967年4月起，公开的报刊上都是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指代刘少奇，用“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来指代邓小平。直到1968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公开的报刊上才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则一直没有在公开的报刊上被点名。

从1967年开始，尤其是在1968年，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在各地上报的有关革命委员会组成人选的文件上，中央往往在批准的文字中列出中央以及当地的“走资派”。在这些文件中，“走资派”的排名大体上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时会加上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对这些人的称呼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此外针对不同的地区还会加上不同的人，如西北地区的各省、自治区会加上高岗、习仲勋、刘澜涛，西南地区的各省、自治区会加上李井泉，中南地区则加上陶铸、王任重。接下来便是这些人在相应某个省、市自治区的“代理人”或“追随者”，见附录二。

“文革”前，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1253人。附录一、二列出了82人，加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共是84人。这还只是经中央批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以及部分在中央文件中点名的，就已经达到了6.7%，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最初设想的“百分之一、二、三”。事实上，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而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的有453人，占总数的36%。受到冲击范围更大，达到1011人，占81%。

在1966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周恩来曾提到被打倒的干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百分之一、二、三。毛泽东回答说：“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然而，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是文革之后所有人全数平反。

附录一：1967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在报刊上点名的走资派：

彭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彭德怀（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前国防部长）  
陆定一（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  
罗瑞卿（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  
杨尚昆（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周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部副部长）  
萧望东（文化部代部长）  
薄一波（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经委主任）  
吕正操（八届中央委员、铁道部部长）  
林枫（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安子文（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杨秀峰（八届中央委员、最高法院院长）  
蒋南翔（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  
张闻天（八届中央委员、前外交部副部长）  
张劲夫（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科委副主任）  
韩光（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防科委副主任）  
陶铸（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顾问）  
王任重（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李井泉（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  
贾启允（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阎红彦（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自杀）  
汪锋（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欧阳钦（八届中央委员、前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李范五（黑龙江省省长）  
乌兰夫（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王铎（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王逸伦（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王昭（青海省省长，1970年2月去世）  
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王鹤寿（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鞍山市委第一书记）  
刘澜涛（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  
习仲勋（八届中央委员、前国务院秘书长）  
胡锡奎（西北局书记）  
马明方（八届中央委员、东北局第三书记）  
陈丕显（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曹获秋（上海市市长，1976年去世）  
杨西光（上海市委书记）  
万晓塘（八届中央委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9月去世）  
张淮三（天津市委书记）  
林铁（八届中央委员、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李葆华（八届中央委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叶飞（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文敏生（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  
赵文甫（河南省委书记、副省长）  
赵紫阳（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方志纯（江西省委书记、省长）  
廖志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赵林（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杨静仁（宁夏区党委第一书记）  
马玉槐（宁夏区党委第二书记）  
陶鲁笭（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卫恒（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自杀）  
王谦（山西省委书记、省长）  
王大任（山西省委书记）

附录二：1967至1968年，中共中央文件中点名的部分走资派：

贺龙（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  
谭震林（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  
萧华（八届中央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杨成武（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代总参谋长）  
江渭清（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陈光（江苏省委常委书记）  
王延春（湖南省委书记）  
黄岩（安徽省委书记、省长）  
赵守一（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李启明（陕西省委书记、省长）

顾卓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喻屏（辽宁省委书记）  
周桓（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  
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员）  
郭林祥（成都军区政委）  
赵健民（云南省委书记）  
范式人（福建省委第二书记）  
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  
贺希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谢王岗（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周仁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  
王其梅（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武光（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  
吕剑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张仲瀚（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军区副政委、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  
伊敏诺夫（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包尔汉（前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